

下面這篇文章是一年多以前刊登在美國報刊《新聯邦主義者》(New Federalist) 上的。然而，它和當今的思想家與政策制訂者密切相關，因為它提供了亞伯拉罕·林肯，孫中山與拉魯旭所代表的美國政治經濟制度，反對英國的自由貿易制度的思想鬥爭史。這場延續了幾個世紀的鬥爭之結果可能將在21世紀90年代末見分曉。世界將會陷入日益貧困、充滿戰爭和悲慘的境地還是31世紀將近入人類史無前例的新紀元，在文化、經濟、科學上復興，根除貧困，使不論在那裡——非洲、印度或中國誕生的孩子都能充分發展齊天賦能力而有益于人類整體呢？這就是為歐亞大陸橋之成敗而奮鬥的目標所繫。

## 即將來臨的大陸橋文明紀元： 拉魯旭、孫中山與中美新夥伴關係

魏若波 (Robert Wesser)

“我認為這是人類修養提高在當今應該全力以赴的決定命運的卓越計劃，正如以往那樣，在我們歐亞大陸的兩端，中國之輝耀東方一如歐洲在地球的另一端彪炳輝煌。也許上蒼天意注定了這樣的安排，這樣一來，當最有修養而且相距最遠的民族伸出手臂迎向對方時，處於它們之間的那些民族也會被逐漸引向更好的生活方式。”

——海·浦·萊布尼茨  
《中國的最新動態·1697年》

1996年5月，在中國北京，中國政府主辦了歷史性的“新歐亞大陸橋區域經濟發展國際研討會”。現在，就在偉大的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做出大陸橋提議三百年之後，歐亞大陸橋的想法是從大陸的另一端傳來。隨著大陸橋的提出，中國政府已經把全球經濟的實體改造引回到在桌面上公開商討，並且已開始與亞洲其它國家合作來在各自的疆域內重建“新絲綢之路”的各條支線。根據中國最新的五年計劃，中國的自然地理將會改變，北京正在大力加速這一大陸橋的整合，並且已開始按照許多項大規模的水利，鐵路與能源

方面的基礎經濟設施計劃進行建設，其目標是在2010年的時候完成（1）。

根據中國新歐亞大陸橋發展促進會會長芮杏文的報告，這一歐亞大陸橋將開創人類文明的第三個紀元，首先是取代古代文明對河網舟楫之便利的仰賴，其次是取代現代工業文明對海岸地帶發展的顯著依賴。這一大陸橋經濟新紀元將使我們這個星球的廣大內陸閉鎖地區（目前約佔地球陸地總面積的80%）打通而得到大規模開發並且進一步培育人類文明。按照芮杏文的原話：

“不難想象，人類未來的活動空間，將不僅不再為海洋所隔絕，而且也將不再為高寒和荒漠而困擾，橫跨洲際大陸的環球高速鐵路、高速公路的暢通，將為人類社會生存、發展、繁榮、發達、開闢出遼闊無限新天地，帶來前所未有的新機遇。它將進一步促使區域經濟的互補與合作；科學技術進步的共創與共享；跨洲際能源、交通、通訊網絡的建設與營運；區域環境質量的開發與提高。所有這些將使陸橋經濟漸漸興起，從而人類社會將走向一個新時代——陸橋經濟時代。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第三個時代。”

萊布尼茨的  
“Novissima Sinica”  
來自中國的最新消息



NOVISSIMA  
SINICA

HISTORIAM NOSTRI TEM-  
PORIS ILLUSTRATURA

*In quibus*

*DE CHRISTIANISMO*

Publica nunc primum aurorata-  
te propagato misit in Europam rela-  
to exibetur, degre favore scientiarum Europaeorum se-  
mibus genetis & ipsius praefatione Monachia, cum & de  
bello Sinensium cum Mongolia pacis conflitu.

multo adhuc ignorante explicatur.

*Edente G. C. L.*

Indicem dabit pagina versâ.

*Secunda Editio.*

Accessioe partis posterioris audi.



ANNO M DC XCIX.

萊布尼茨 (1646—1716)

歷史上，亞歐兩大洲就有悠久的經濟文化交流與合作的好傳統。遠在2000多年前，古絲綢之路就將兩大洲聯繫到了一起。依托古絲綢之路展開的經濟文化交流與合作，不僅為人類社會創造輝煌的古代文明起過巨大作用，也對造就近現代文明產生重大影響。至今，它們還是聯繫亞歐兩大洲的一條重要的精神紐帶。新亞歐大陸橋就是在它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所以又稱·現代絲綢之路·。它必將為擴大現代亞歐經濟文化交流與合作發揮更大作用。

中國人當前的倡議有力地回應了偉大的中國政治家孫中山博士在20世紀初期對世界政治的介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孫中山認識到了為“英法協約”帝國主義列強地緣政治利益服務的“和平協約”這一迫在眉睫的危險。在1919年，即凡爾賽會議的同一年，孫中山發佈了中國通過與歐亞大陸其他國家的整和而發展的綜合計劃行事的另一政策提議。孫將這一政策書取名為《建國方略》並把它設想為預防進一步衝突和佔正統的全球計劃中心內容。

最近時期以來有關開發歐亞大陸的第一個公開綜合提議，是由美國經濟學家與前美國鴻桶候選人拉魯

旭在1988年10月于當時的西柏林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提出的。拉魯旭提議，有鑑于蘇聯與經互會國家燃眉之急的經濟崩潰，東德和西德的儘早統一就成為迫切的要求，這是為了給東歐（從波蘭開始）和最終在俄國並繼續往東延伸的極其必要的經濟重建提供必要的先進工業科學基礎。當東歐邊境開放了一年之後，拉魯旭提出一項名稱為巴黎、柏林、維也納“生產三角”的建議，其目的是把這片具有世界最高密度工業與科學實力密度的區域變交通樞紐和聯成一體的發展走廊來開發東方的一臺發動機（2）。以往在1983年8月，拉魯旭曾發表一項提議為《印度洋太平洋流域50年發展政策》。在這個提議中，拉魯旭列舉了為使地球上這個人口最多地區充份發揮其經濟潛力所需內容衆多的宏偉基礎經濟設施計劃（3）。在蘇聯解體之後，拉魯旭把它的“歐洲三角”提議擴展為把整個歐亞大陸捷運公路，水路以及能源生產與分配這樣一個合為一體的基礎經濟設施計劃群包括在內（4）。

然而，當前，中國是世界上僅有的確實從事于現實的實物經濟發展的主要國家。在以往25年中，建立在各種“自由貿易”與“後工業教條”基礎上的世界

經濟日益“全球化”，事實上已摧毀了美國經濟的整個領域，尤其是在技術要求較高的生產部門。歐洲也由於全球性的“馬稀特刺西瓜式”過程而遭受重創，其工業生產能力比1989年減退了40%。在俄羅斯與烏克蘭，以所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形式進行的全球化過程，使得他們的工業生產自從蘇聯解體以來下跌了70%。

與1996年北京會議清楚闡明的全球未來影響形成強烈對比的是由倫敦市支持的全球主義體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等）繼續堅持要世界各國消極地服從那一套以在世界歷史上導致了最大投機金融泡沫兒，現在全球人們有目共睹世界處于崩潰過程的“自由貿易”教條！以倫敦市為中心的金融機構與原材料卡特爾，對這一崩潰過程驚恐

倫敦市馬前卒對南亞和東南亞經濟猛烈“襲擊”所造成的破壞，顯示了當全球金融泡沫爆裂時世界各國正被禍水所淹沒。

在這類危機充斥的時期，世界所需要的是有一個正確觀念來引導，以及對這個正確觀念的歷史的知識。顯然，已經失敗的超國家體制政策及其使整個世界“私有化”的可怕計劃必須拋棄，而代之以一套完全不同的政策以及主權政府的雙邊協議。按照此一精神，我們向讀者介紹孫中山在21世紀初的實業的思想與世界歷史意義，以及當前人們必須為美國政治家林登·拉魯旭的思想而鬥爭的世界歷史意義。惟有這樣做，我們深信，美中新型夥伴關係才能夠迅速成為人類文明得以成功地進入大陸橋紀元之道路，並提供對於那些阻礙其自然發展的力量的一貼解藥。



孫中山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Library of Congress

萬狀，它們正拼其全力嘗試打進無力抵禦的任何弱小國家，而且還在“私有化”與“金融重組”的幌子下以史無前例的規模攫取對全世界戰略礦物與原材料的控制。最近對中非人民犯下的大規模滅族大屠殺，在被這一批以倫敦為中心的“全球主義”經營貪婪成性的慾望所支配的世界上，令人恐怖地表明了未來景象（5）。與此類似地，最近由諸如喬石·索羅斯之類



林登·拉魯旭

## 與帝國相反的大陸橋

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倫敦在背後撐腰的那些“全球化”與“私有化”政策是從哪裡來的呢？在他的1996年文獻《現在就得讓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擺脫協約國！》中，拉魯旭解釋說：

“在21世紀至今為止，全世界各族人民正義事業

的唯一最大障礙，一直是那種無理偏執的英帝國及其幫凶阻撓工業化西歐大陸與太平洋印度洋週邊國家之間建立有效連續經濟合作形式的所謂“地緣政治”決定論。本世紀初俄國與日本之間的那場由英國人挑起的戰爭，在那以後兩次所謂“世界大戰”，以及瀕臨洲際熱核戰爭的曠日持久征逐，都是以英帝國及其附庸的首都為中心的不難看透的“地緣政治利益”所強加給各國人民的。那一被耽誤了的，將比較遼闊而極不發達的中亞地區聯繫起來的做法，是使整個世界失誤經濟恢復與持續增長的自然樞紐。

從法國不列斯特經過象柏林那樣的巨大鐵路中心，直到太平洋與印度洋沿岸的現代鐵路與磁懸浮交通形式，是整個世界實物經濟恢復全球增長率的自然關鍵。這些交通網，在由經過改善和擴大的內陸水路系統以及受交通網限制的發達地區動力生產和輸油管等基礎經濟設施單元來加強之後，為歷史上經濟增長的最大經濟擴展打開了穿越歐亞大陸的後門……”（6）

正如拉魯旭的偉大教導所指出的那樣，合為整體的歐亞大陸這個想法一百多年來一直是英帝國的歷史夢魘，而本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都是英國發動來破壞這條鐵路的。正如《執行策略評論》所獨家刊載的文獻（7）所指出，歐亞大陸整合為一體的現代來源是一群以費城為基地的美國民族主義政黨成員所設想的19世紀全球發展計劃，這些成員在亞伯拉罕·林肯總統的領導之下，領導了美麗堅和中國去戰勝由英國撐腰的南部聯邦奴隸主扼殺美麗堅共和國的企圖。這個19世紀“大陸橋”提案的帶頭組織者是林肯的主要經濟學家桁肇·惕晉。在1876年，也就是美國立國100週年紀念年，惕晉寫了著名的小冊子《與英國自由貿易相反的商業、基督教與文明…》，這一嘹亮的號角聲宣示了世界經濟發展，單獨指出了英國君主制以鴉片來摧毀中國是那一時代的主要罪惡。

林肯·惕晉民族主義政黨成員成功地把它們的經濟革命傳播到德國，俄國，日本和其他地方，而且在19世紀末創立了世界歷史到那時為止的最大科學與工業強國的聯盟。惕晉在俄國的盟友（該國對於美麗堅和中國在美國內戰中取勝起了及其重要的國際作用）成了西伯利亞鐵路這條“橫貫歐亞大陸”的陸上途徑的建設者。在1880年，以費城為基地的惕晉和果人幹蔓·芬緝是幫助俄國建立現代海軍以對抗英國的太平洋艦隊的關鍵人物，它們甚至已與中國政府協商建立美國式的銀行，以及為了中國的統一與軍事防務而建立鐵路與電訊線！

由於英帝國掠奪世界的強權是建立在它對海上貿易的壟斷及其各“阻扼點”（即直布羅陀，蘇伊士新加坡等等），19世紀以美國德國為中心（因此顯然是反對英帝國的）歐亞大陸整合與發展計劃之成功執行，會永遠結束英帝國對世界經濟的壓制。在20世紀初，英國的“地緣政治政客”象鈴邁戴·勸善德，顯耜禍福與其它一些人，公開聲明倘若准許這一歐亞大陸的開發，那麼“大西洋週圍的列強，即英荷帝國及其歐洲同盟國將永遠喪失權力。否則這一英帝國的龐大“地緣政治”戰略就將變成所謂“實力政治平衡術”。實際上這意味著處心積慮地操縱各國以及列強各國彼此反對。通過這樣的背信棄義與欺詐，該帝國確實做到了，只要使整個大陸處於不斷的衝突與戰爭之中，就可以容易地破壞開發歐亞大陸的任何鐵路同盟。

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當代對英國地緣政治戰略最精確的分析是由孫中山做出的。在《中國存亡問題》這一除了我們之外無人知道的文獻中，孫中山揭露了英國的這一龐大戰略；並呼籲北洋政府保持中立和千萬不要加入英國的協約國計劃：

“…要之當其最強之際，英國必聯它國以敵之。及其有它國更強，則又聯之以共敵它國。二世紀間，英國之外交政策，未嘗變也。其以一國為友也，非有誠意之結合，不過利用之以攻擊它國，以友國軍隊為己之佣兵，敵其所愾而已。及乎強敵既挫，惟有友強，則又轉而以友為敵，而英國始終居于使唆之地位。戰則它國任其勞，勝則英國取其利，此則數百年來未嘗變者也。…”

“無他，英之求友邦，貴能為英盡力，今既無力，自然應以其國為英之犧牲。比如飼蠶者，三眠以前，東橐伐桑，昕夕視候，惟恐不逮。孝子之養父母，無以過也。繭抽絲盡，則命燭鼎鑊，骸飽魚鱉，今日英之友邦，皆蠶也，其猶得英之承迎者，絲未盡爾。…”（8）

到了1917年，英國正是通過孫中山在那時所述，與拉魯旭如今所述的地緣政治手法來操縱引發俄日戰爭和巴爾干衝突的過程。這導致了英國與法國結為協約國，後來又成為英、法、俄三國協約。協約國最後又吸收了腐敗的美國成為成員；在1902年威廉·麥金利總統被英國暗殺後，美國越來越被與英國皇室結盟

的親南部邦聯贊成奴隸制的份子在政治與文化上控制，這一“勢力平衡夢魘達到了它所要求的效應，破壞了歐亞大陸的一體化與開發並且使世界陷入歷史上最血腥的戰爭之中。

## 孫中山的建國方略與 凡爾賽的對比

在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災難之後，孫中山充分認識到，世界和平的唯一真正前途在於19世紀大陸橋設想的復興，這一回是以中國作為歐亞大陸陸上網路復興的新基地，而中國的大規模現代化與工業發展“推動”了大陸橋復興。因此，在世界上作為《建國方略》來傳播的這一計劃，能夠完全挫敗英國對於歐洲亞洲的地緣政治戰略，這一戰略的唯一結果就是加劇衝突與戰爭。所以，孫中山博士在1919年撰寫的《建國方略》就是為著上述目標而在那時提出的原則性國際提案。

孫中山提議的十萬英里鐵路交通網將會把中國與歐亞大陸其他主權國家聯繫成整體，最終將會包括殖民地化了的南半球。1919年在國際上廣泛傳播的《建國方略》具體地代替了英國授意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凡爾賽公約的調解。孫中山計劃的核心是通過與歐亞大陸其他國家的聯合來開發中國。在《中國之國際開發》的第一項綱領中，孫中山博士優先考慮的是在蒙古平原上修建規模巨大的從東到西的鐵陸網。這一宏偉的計劃，包括了一個與7千英里鐵路相連的華北深水港，將起通向世界其它地區的“門戶”作用，沒有這一門戶中國的內陸就得不到適當的開發。這一宏偉規劃將包括：

(一) 筑北方大港于直隸灣。

(二) 建鐵路統系，起北方大港，迄中國西北極端。

(三) 殖民蒙古新疆(8—1)。

(四) 開浚運河，以聯絡中國北部中部通渠，及北方大港。

(五) 開發山西煤、鐵礦源，設立制鐵、煉鋼工廠。

“右列五部，為一計劃，蓋彼此互相關聯，舉其一有以利其余也。北方大港之筑，用為國際發展實業計劃之策源地。中國與世界交通運輸之關鍵，亦繫夫此。”

孫中山博士的“世界”並非僅指那些壟斷了經東太平洋海港與中國開展貿易的海上強國。孫中山博士把中國與“世界”聯繫起來的觀點，包括了戰略上的向西突進，從而把中國與歐亞大陸的其它部份聯繫起來：

“此種鐵路，實居支配世界的重要位置。蓋將為歐亞鐵路系統之主幹，而中、歐兩陸人口之中心，因以聯絡。由太平洋岸前往歐洲者，經此路線為最近；而由伊犁發出之支線，將與未來之印度、歐洲線路（即行經伯達，以通達馬斯加斯及海樓府者）聯絡，成一連鎖。將來由吾人所計劃之港，可以直達好望角城。綜觀現在鐵路，于世界位置上，無較此重要者矣。

(8—2) ”

孫中山博士然後大膽地提議，以他的1919年計劃作為任何戰後國際協議，尤其是新組成的國聯之“拱門的冠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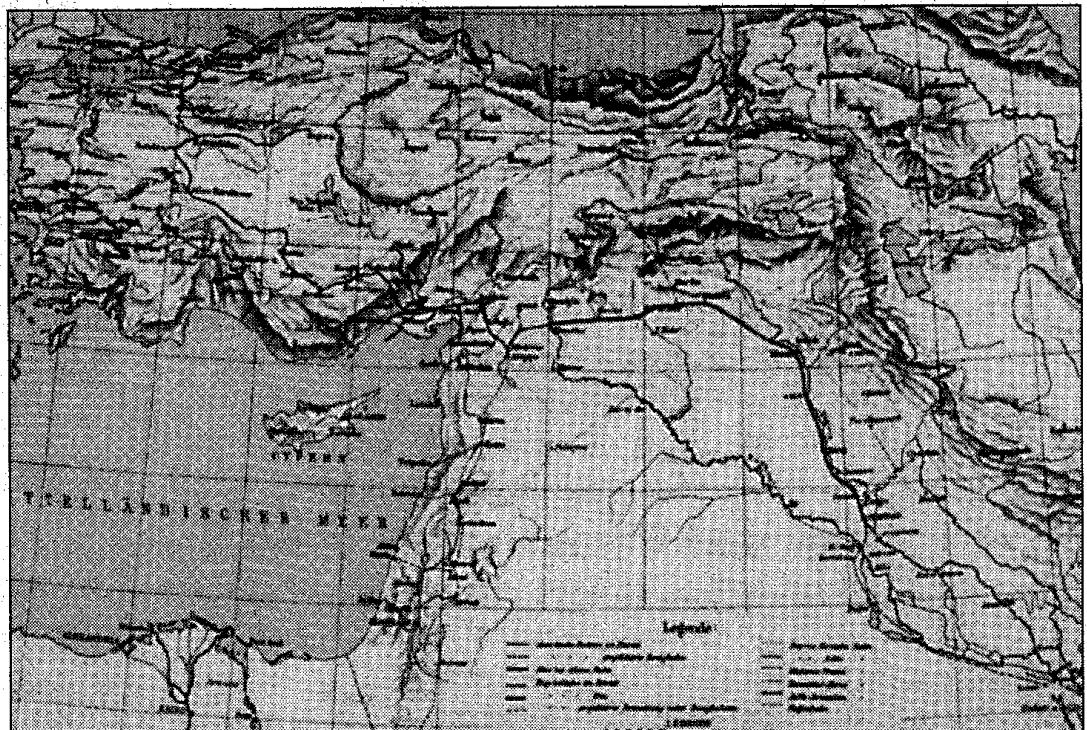
“如使上述規劃果能逐漸舉行，則中國不特可為各國余貨消納之地，實可為吸收經濟之大洋海，凡諸工業國，其資本有余者，中國能盡數吸收之。不論在中國，亦在全世界，所謂競爭，所謂商戰者，可永不復見矣。

“…自美國工商發達以來，世界已大受其益，此四萬萬人之中國，一旦發達工商，以經濟的眼光視之，何啻新闢一世界！而參與開發之役者，亦必獲超尋常之利益，何無益也。且此種國際協助，可使人類博愛之情，益加鞏固，… ”

在《建國方略》的某一版序言中，孫中山博士向全世界清楚地發出警告，他的提議是為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戰所絕對必需的。

這應該說是與許多近代的看法相反。孫中山驚人的國際提議肯定不是天真地拋入政治真空的一場與世隔絕的烏托邦夢。這裡有必要強調，孫中山在國際上獲得支持的關鍵基礎部份在於一群熱心擁戴林肯（也很親華）的美國愛國者，例如以夏威夷島為傳教基地的佛蘭克·戴蒙牧師。這些美國人與他們的中國盟友幫助

19世紀開工，直到1940年才完成的柏林至巴格達鐵路的東段。原因在於不列顛地緣政治的干擾，其中包括英國人為此而挑起的兩次世界大戰。



孫中山在夏威夷建立了第一個“興中會”，並且與暢譽一林肯的美國十九世紀“大陸橋”國家主義政黨成員有著政治上與歷史上的直接聯繫。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外交部長瓦爾特·拉燈訥博士那一批贊成開發的工業界人士（暢譽等人的19世紀德國盟友界）不再受德皇的戰時限制，又與孫中山博士在上海的朋友們開始進行參預中國宏偉計劃的廣泛討論。與此同時，拉燈訥與妻妾林在1922年5月進行了有關聯合經濟開發的獨立德俄“砬葩晤”協議的談判。在那段時期還有來自美國西部沿海的工業界人士談判了價值30億美元的對俄貿易，以取得在西伯利亞開採煤和石油的特許權為交換條件，來援助俄國的工業化計劃。拉燈訥與妻妾林在1922年簽訂的獨立“砬葩晤協議”就這樣開啓了一個有可能實現的德、美、俄、中戰後同盟的重組過程，籍以開發俄中兩國，並以重新啓用的洲際鐵路網把這兩國連接起來。這一內容更新了的歐亞大陸橋同盟，被孫中山的中國經濟與中華民族大發展計劃所確定將把大英帝國及其“地緣政治”永遠埋葬。

正如美國被拉到英國這一邊參與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件事所表明的，也許這一時期最大的悲劇是美國偏離了林肯—暢譽民族主義黨人的全球眼光而趨向腐敗。在孫中山于1919年做出提議的時候，美國的兩大黨都被親英帝國分子接管了，他們企圖利用美國的實力與影響來為英帝國效勞。愛國的總統林肯、嫁妃而得先後被暗殺，最後于1902年危懲·勸脣鬲也被殺，

這幾件事使得美國的總統職位落到了自稱為“秧歌鑼·擦縛僧族愛國者”的醜異穢·裸耜黻手中，他舅舅施沐醜·部落客曾經是南部邦聯在歐洲秘密特工頭目。裸耜黻的繼任者盜德晤·洧邇巽是英國貴族統治集團的狂熱仰慕者，他的親南部聯邦的政府聽憑恐怖主義的三K黨大規模招募新成員，從而得以在20世紀20年代增加到500萬名成員！因此，洧邇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居然願意與協約國結盟來挽救遭受威脅的英帝國。

這一親英派接管美國外交與經濟政策的程度也許可以從美國商業部對孫中山博士1919年提議所作的官方答復中充份看出。在一封日期為1919年5月（凡爾賽會議後一個月）致孫中山博士的信中，美國商業部長隗·誅得箇併德對孫中山的答復與一個當今世界銀行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金融官僚或會計師的口吻同出一轍：

“…您無疑充份知道，即使要實行您的提議之一小部份都得花費幾十億美元，而其中大部份分項目在今後若干年内都無法支付利息與開支。所以，首先要決定的問題是怎樣償還必須的貸款的利息。中華民國的稅收須承受現有的政府借貸的利息以保證進一步的支付，因此目前看來有必要把發展計劃局限於能充份盈利而吸引私人投資的那些計劃上。”

儘管洧邇巽的總統職位在1920年被渦輪·哈磚所接替，他的政治基礎包括了比較傾向于開發的反英的

美國工業家，但背信棄義與謀殺仍被證明為最終破壞這一有可能實現的歐亞跨洲開發聯盟的有效武器。在1922年夏季，砬砲網協議簽訂了才幾個月，溫邁·拉燈炳就在德國輕易地被人暗殺了。與此同時，有人掀起一場對孫中山博士的大規模攻擊，其目的在把他在南方的政府趕出廣州而且如有可能就殺害他。這場對孫中山的攻擊由軍閥陳炯明發起，得到了匯豐銀行倫敦分行經理殃辭·怡羅耜的50萬美元財物資助！在這之後不久，哈定總統在美國西岸之行中神秘地死于被宣稱是“食物中毒”的後遺症。由于倫敦唆使凡爾賽條約國做出金融禁制而使德國經濟幾乎崩潰，世界隨之發生大蕭條，于是導致法西斯主義以及正如孫中山博士所警告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爆發。

## 中國“固有的智識” 與美國的制度

按照抗這一歷史觀，英明的拉魯旭極力主張美國：在中美當前新的夥伴關係基礎上，重新由美國擔負治理于歐亞大陸開發的強國重任，之極其重要性已變得更清楚。但是，這一新的中美夥伴關係該建立在哪一種更深的基楚上呢？

讓我們更進一層地看一看孫中山的政治經濟思想之哲學基礎。

在孫中山于1923年所作的關於三民主義的系列講演的最後一講中，他滿腔熱情地呼籲全體中國人民，把復興中國“固有的智識”，與美國及歐洲大陸的最高科學成就結合起來，作為現代中華民國的唯一現實基礎。就象萊布尼茨與美國的開國元勳們那樣，孫中山力主以個人的道德修養作為現代中華民族國家的基礎與使命。從孔夫子的種種總論述中，孫中山選出了《大學》之道：

…中國有什么固有的智識呢？…中國所有一段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在外國的大政治家還沒有見到，還沒有說到那樣清楚的，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話，把一個人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象這樣精微開展的理論，無論外國什么政治家、哲學家都沒有見到，都沒有說出，這就是我們政治哲學的智識中所獨有的寶貝，是應該要保存的。”

在上引同一篇講演中，孫中山闡明了，以這一“固有智識”作為基礎，中國就能迅速吸取西方的科學進步，“所以人力可以巧奪天工，天然所有的物力，人工都可以做得到。”

在1918年12月，孫中山明確地告誡他的革命同志們，個人心智的發展是一切政治的與經濟的發展之基礎：

“兵法有雲：‘攻心為上。’，是吾黨之建國計劃，即受此心中之打擊者也，夫國者人之集也，人者心之氣也，而國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現象也。是故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則反掌折枝之易，亦無收效之期也。心之為用大矣哉！”

“夫心也者，萬事之本源也，滿清之顛覆者，此心成之也；民國之建設者，此心之敗之也。夫革命黨之心理，于成功之始，則被，知之非難，行之惟難，之說所奴，而視吾策為空言，遂放棄建設之責任。…而國事則日行糾紛，人民則日增痛苦。”

很合乎道理的是，孔子以個人道德發展（修養！）作為治國基礎的這一理想，即孫中山的政治與經濟思想的核心。亦完全與食物經濟的傳統“美國制度”辦法合拍，並且與拉魯旭當前將那些思想加以科學促進一致。為了以實例說明這一點，我們從前面已引用過的拉魯旭早在1966年寫的關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文章中摘引幾句話，儘管我們極力推薦大家閱讀拉魯旭的這篇著作與其他著作之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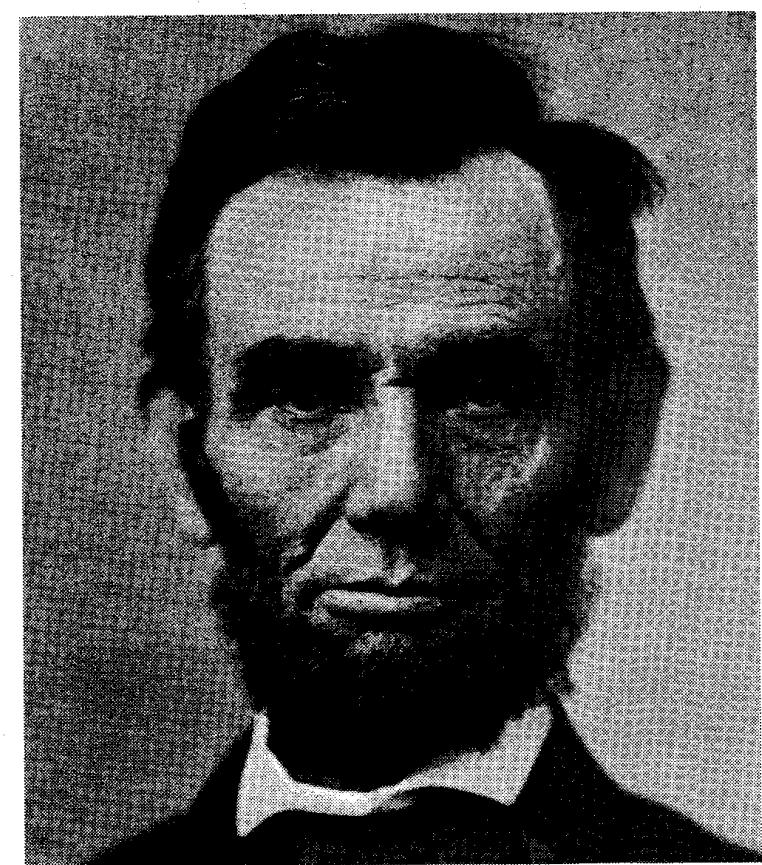
“…人類脫貧致富並且高於禽獸的最有價值的區別，是唯有人類才能繼承的認識能力，這一能力技能實現又能理解對於我們的宇宙的自然原理的有效公理革命性發現。正是得力於這一點，人類征服宇宙的人均能力成功地得以增加。按照《聖經·創世紀》第1：26–30節所包含的意思，人類的靈魂就是這樣的。”按基督教定義的人類本性，是物理科學的一個分支即1671–1716年期間由割特佛裡特·萊布尼茨最先提出並進一步加以加以發展的食物經濟學的主題。在這一科學分支中，我們按照上帝造的地球表面相關面積上每人、每戶和每平方公里的改善率來測量社會中的人口統計成數。對於這些速率的測量連同包含了以勞動生產力的潛在增長為基礎的有效含糊概念，這僅可能的從物理科學與古典藝術形式中的有效公理革命性發現之累積水平推導出來。” 10

在歷史上，美國的政治經濟制度是與本杰明·福蘭克林以及第一屆美國財政部長亞力山大·漢密爾頓，偉大的德國鐵路設計者佛裡德利希·里斯特，以及上文引述的美國民族主義政黨成員亞伯拉罕林肯—亨利·湯普遜相關聯的。美國革命之13個殖民地堅決要求脫離英帝國而獨立，以建立一個獨立自由而且全體公民“生命、自由和追求性福”的不可剝奪權利都得到保障的共和國。這樣的國家必須採取絕對單一民族國家（共和國）的主權形式，通過由政府支持的國家銀行貸款，可以促進基礎經濟設施、製造業、採礦業、普遍教育等的發展。按照這一方式，單一民族的主權國家通過創造為社會擴充真正的財富所需的物質與文化條件來“增進一般的福利”：不斷增長如拉魯旭教導的潛在增加能夠“篡奪自然力”的人類思維密度。因此，美國的基督教政治經濟制度是作為英國那種建立在高利貸、奴隸制與對殖民地的剝削基礎上的寡頭政治“自由貿易”制度之直接對立物而形成的。

在構成孫中山最著名的學說“三民主義”的一系列演講中，孫中山精確地集中于採用國家來開發民族“勞動生產力”的觀念。根據孫中山博士的說法，中國必須做到：

“第一是交通事業；象鐵路運河，都要興大規模的建築。第二是礦產，中國礦產極其豐富，或藏于地，實在可惜，一定是要開闢的。第三是工業，中國的工業，非要趕快振興不可，…辦要趕快用國家的力量來振興工業，用機器來生產，令全國的工人都有工作。”

作為孫中山政治哲學核心的三民主義，其實不過是把亞伯拉罕·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這句話所規納的人類政治自由制度化思想重新做了個公式化的表述而已。“民權”主義是確保共和國（或民國）的公民們治理自己的國家，不受英國封建與金繁融貴族政治的奴役之權利與責任。“民族”原則是保障單一民族國家的主權，使之免于遭受外來帝國主義的操縱與支配，或國內的不統一，無自治州權狀態最終導致的內戰。然而，就象美國的開國元勳們那樣，孫中山也認識到，惟有當廣大民衆脫離了貧困與落後之後，中國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與主權。要實現這一點，必須國家以其使命而統一起來，通過象國營鐵路建設、農業現代化、國營水利建設、慈善教育等等“龐大的宏偉計劃”來增進“民生”福祉。



亞伯拉罕·林肯

因此孫中山是堅決主張中國革命運動的領導者必須是徹底的民生主義者。

“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經濟的中心，和種種歷史活動的中心，好象天空以內的重心一樣。從前的社會主義，錯認物質是歷史的中心，…再不可說物質問題是歷史的中心，要把歷史上的政治和社會經濟種種問題，都歸之于民生問題…”

隨著作為民衆“勞動生產力”即作為單一民族的國家之基礎的民生主義的發展，人們所假設的“階級戰爭”之類就可逕人而解。在下面這段話中，孫中山重複了美國制度的觀念，即允許勞動力繁榮時勞資之間可能出現的“利益和諧”：

“…因為社會上的生產力很大，一切生產都是很豐富，資本家固然是發大財，工人也可以多得工錢。象這樣看來，資本家改良工人的生活，增加工人的生產力；工人有了大生產力，便為資本家多生產；在資本家一方面可以多得出產，在工人一方面可以多得工錢，這是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相調和，不是相衝突。社會之所以有進步，是由于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于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有衝突。…階級戰爭，不是社會進化的緣因，階級戰爭，是社

會當進化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這中病症的緣因，使人類不能生存；因為人類不能生存，所以這種病症的結果，便是起戰爭。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所有的心得，只見得社會進化的毛病，沒有見到社會進化的原理；所以馬克思可說是一個社會病理家，不能說是一個社會生例假。”

孫中山博士所堅決主張的民生主義也使他得以看穿英屬東印度公司僱員麥嘜鸞·馬爾薩斯及其偽理論“人口零增長”的欺騙性：

“百年前有一個英國學者，叫做·馬爾賽斯（T·Malthus），他因為憂慮世界上的人口太多，能供給的物產有限，主張減少人口，曾創立一種學說，謂：·人口增加是幾何級數，物產增加是算術級數，法國人因為講究快樂，剛合他們的心理，便極歡迎馬氏的學說，主張男子不負家累，女子不要生育；他們所用之減少人口的方法，不但是用這種種自然方法，並且用許多人為的方法。法國在百年以前的人口，比各國都要多，因為馬爾賽斯的學說，宣傳到法國之後，很被人歡迎，人民都實行減少人口，所以弄到今日受人少的痛苦，都是因為中了馬爾賽斯學說的毒。中國現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馬爾賽斯學說所染，主張減少人口的；殊不知法國已經知道了減少人口的痛苦，現在實行新政策，是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想法國的民族和世界上的民族，永久並存。”

所以計劃生育就是馬爾薩斯主義。在關於民生的講演中的一段精彩的話中，孫中山證明瞭當我們處理現實發展問題時這一“毒害人心的馬爾薩斯理論”簡直是騙人的：

“用中國和法國來比較，法國的人口是四千萬，中國的人口是四萬萬；法國土地的面積，為中國土地面積的二十分之一；所以中國的人口比法國是多十倍，中國的土地是比法國大二十倍。法國四千萬人口，因為能夠改善農業，所以得中國二十分之一的土地，還能夠有飯吃。中國土地的面積，比法國大二十倍，如果能夠仿效法國來經營農業，增附加出產，所生產的糧食，至少要比法國多二十倍。法國現在可以養四千萬人，我們中國至少也應該可以養八萬萬人；全國人口不但是不怕飢荒，並且可以得糧食的剩余，可以供給他國。”

可見人口不應控制。美國的開國元勳們將未來的美利堅合衆國構想為“全人類的希望之燈塔與自由之

殿堂”。與此類似地，孫中山把三民主義指導下的現代中國的使命定位對於全人類利益的“神聖天職”：“所以中國如果強盛起來，我們不但是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於世界負一個大責任，如國中國不能夠擔負這個責任，那麼中國強盛了，對於世界沒有大利，便有大害。中國對於世界究竟要負什麼責任呢？現在世界列強所走的路是滅人國家的，如國中國強盛起來，也要去滅人國家，也去學列強的帝國主義，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們的覆轍；所以我們要先決定一種政策，要·濟弱扶傾·，才是盡我們民族的天職。我們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於世界的列強要抵抗他，如果全國人民都立定這個志願，中國民族才可以發達；若是不立定這個志願，中國民族便沒有希望！我們今日在沒有發達之先，立定·濟弱扶傾·的志願，將來到了強盛時候，想到今日身受過了列強政治經濟壓迫的痛苦，將來弱小民族如果也受這種痛苦，我們便要把那些帝國主義都來消滅，那才算是治國平天下。

## 爲了新的中美夥伴關係

和75年以前不一樣的情況是：當今的美國幸有拉魯旭所領導的活躍而且有力的政治力量以及他的英明思想存在於，並且正在成功地決定著克林頓政府的美中合作政策，以期使美國回到林肯一場的真實經濟發展傳統上。在美國這一偉大戰役的成果將為歐亞大陸的開發確保新的中美夥伴關係。美國制度與拉魯旭的食物經濟科學翻天覆地在性質上接近于孫中山按儒家官典來看待中國及全人類的使命，這導致了思想上的絕妙和諧，能夠很迅速地成為這一新夥伴關係的基礎。孫中山的這一精神在當今中國民運中的再度振興不但已經起了（而且必然繼續會起）必不可少的作用並有助于把新的生命氣息送到美國的靈魂之中。

象聲名狼藉的·眇邇P·柯煙臺那樣地現代僭稱“地緣政治”喉舌，以試圖宣稱在不久之後即將發生的主要東西方衝突將是在美國與中國之間。對於老老實實地研究過美國真實歷史、孫中山的生平以及當今拉魯旭的偉大著作的那些人來說，柯煙臺先生及另一些人的“分而治之”“實力平衡”政治已經昭然若揭。幸運的是，這樣的實力平衡政治學說與分析在他們所賴以作為前提的腐朽金融制度的重壓下正在崩潰。相反地，我們真誠地相信，如果讓人選擇，絕大多數美國人寧可在通向文明的新大陸橋紀元的道路上與中國的兄弟姊妹們並肩前進；您可是留意孫中山博士在

1912年向率先承認中華民國的美國的公民發表的聲明  
《致在美國的中國之友》中的話所體現的警告與智慧：

“我們深深懂得有些執政者，不包括現有的某些國家，會以或多或少的滿意心情來看待這個新國家（中華民國）國內的交戰。他們將會把內戰作為達到他們自己的目地與預謀之步驟而歡迎這場北部與南部各省之間的內戰；就象50年前有人（在某些地區）悄悄贊成那一場可怕的美國內戰。”

“在你們偉大的共和國黑暗的日子裡活著的當今這一代美國人，會回憶起人們心中的感覺——當他們得知外國人希望與祈禱摧毀美利堅合衆國時油然而生的悲戚痛苦心情。

“假如那場戰爭是按南方的觀點戰勝，並且已建立了兩個互相脫離的共和國，難道沒有可能最終建立半打或更多個弱小國家嗎？我相信結果會是那樣；我還相信，當一個偉大的國家在政治與商業上被分割後，外來者遲早會涉足于把美國變成他們自己的地方。我不相信我的這番話是危言聳聽。要是那樣的話，我就等於未曾讀過歷史、也未曾理智地研究過人們和各個國家。”

“並且我還覺得我們和美利堅共和國一樣有著來自外國的敵人；因此在某些國家首都最受歡迎的聲明是在中國發起叛亂來反對憲政當局。”

“這是一份難以發佈的聲明；但我相信說真話從而全世界可以了解和承認它”。

如今，中國的愛國者們實在是很幸運的，他們的領袖有機會按照拉魯旭的教導引導世界進入大陸橋的新紀元。顯然，一個以儒家思想和孫中山思想為指導全民思想的理論基礎，並且與在拉魯旭思想的影響和指導下的美國政府結盟的中國，是為打敗我們共同的“外敵”英國人、威尼斯人和聯合國所必須形成的聯盟組合。為了這一目的，我們認為對於中國新領導人最重要的並極力建議的是：進一步更深入地學習和回顧拉魯旭的原著（現在已有日益增多的中文譯本），以及孫中山思想。這一考驗誰是中國的真正的愛國者的偉大的挑戰，已在孫中山博士關於民族主義的第六次講演的最後一段話中得到了最佳的表述：

“我們要將來能夠治國平天下，便先要恢復民族主義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和平道德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這便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大責任。諸君都是四萬萬人的一份子，都應該擔負這個責任，這便是我們民族主義的真精神！”

1·有關北京會議的細節，包括迄曝·拉魯旭女士與其他人的講演稿，見EIR，第23卷25期，1996年7月14日《全球戰略通訊》第7卷，第7—8號，1996年8月。

2·通過制定《戰略防衛動議（星球大戰計劃）》來闡明這一過程，拉魯旭本人能起的作用，詳見1996年7月19日《執行策略評論》英文版（EIR），第23卷第9期所刊登的林登·拉魯旭《戰略防衛動議——宏偉的戰略技術觀》一文。在江澤民克林頓于華盛頓舉行會談前夕，拉魯旭發表的演說《美中戰略夥伴關係》也是一篇闡述當前歐亞大陸橋政策及其拉魯旭戰略防衛動議來源的極其重要的文獻！這篇演說詞刊登在EIR1997年10月31日第34期上。

3·見EIR1983年8月刊登的《印度洋太平洋流域50年發展政策》這一著作的中文節譯本現有影印的。

4·關於歐亞大陸橋與這些基礎經濟設施規劃的完整而且內容已更新的詳細敘述，見EIR英文版290頁的報告專輯《歐亞大陸橋——新絲綢之路——世界範圍開發的火車頭》（1997年1月）

5·詳細敘述見《全球戰略通訊》1997年9月第8卷第5期所載〈不許歷史重演！非洲需要通過發展求和平〉一文。

6·《全球戰略通訊》1997年2月第8卷第1期所刊登的〈現在就得叫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擺脫協約國〉一文。

7·見《執行策略評論》（EIR）1997年5月2日，第24卷第19期所刊載的〈大陸橋：衍蔓·惕晉的全球發展規劃〉一文。

8·譯者注：1、殖民=移民；2、以上三地名如今通行的譯法是“巴格達，大馬士革與開羅”

9·這裡重要的是指出，儘管發生了這場可怕的悲劇，中國人民與美國人民之間在現代歷史上的密切關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輝耀史冊。首先是抗擊日本帝國，其次是抗擊英法兩國在亞洲殖民霸權野蠻殘余的戰時中美同盟，尤其從富蘭克林·羅斯福與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的角色中得到例證。

10·同上引。關於拉魯旭經濟方法的透徹綜述請參閱拉魯旭發表在1995年英文版《執行信息評論》（EIR）上的經濟學教科書《那麼，你想把關於經濟學的一切都學到》（So，You Wish to Learn All about Economics），該書可由EIR社供應，《全球戰略通訊》編輯部亦可以提供該書摘要漢譯本。